

难忘的军旅生活

王新东

1979年冬天,我从招远县应征入伍,被分配到济南军区烟台某部队油库任司泵员,主要是担负油料收发任务,责任心要求很强。

我们油料班八个战士工作量很大。每个月接受油田发运几十个大油罐的汽油、柴油,每个油罐盛汽油、柴油约在50吨左右。我们每一次作业,战士们都不怕苦、不喊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我们的领导于立强、赵启华、谷彦夫也和战士们一样共同作战,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一次次任务。如果,夜间接到工作任务,领导还给我们做夜餐,给予了战士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一生难以忘记。

我们班每天都要给驻胶东地区的海陆空军各部队发放各类品种油料。每月还要向长山要塞部队供应桶装汽油、柴油,工作量也很大。通过烟台港、

长山要塞部队运输船,将战备油料运进岛内,保障了岛内部队作战训练。为了减轻战士们的劳动负荷,领导赵启华发明了吊装油桶设备,获得了军区的嘉奖。

1981年秋天,总部和军区在胶东地区进行了一次大型野战油料运输保障演习。从栖霞县某部队油库向我部队输运汽油。远距离输运汽油危险性很大,需要的油管很多。管与管连接要求很严格,绝对不能漏一滴汽油。演习历时多日,沿途有很多部队的精兵,昼夜站岗执勤,严防敌人破坏。演习中,我们的领导对战士们特别关心,处处严格要求我们安全第一,确保演习成功。演习结束后,我们班工作突出,收到了上级首长的表扬。

部队这个大熔炉历练了我永不言败、勇往直前的品质,给我人生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富。我非常想念我的领导于立强,真想再见他一面。

怀念何冠奇老师



作者与何冠奇(右)合影。

赵明通

惊悉何冠奇老师不幸去世的噩耗,心中如五雷轰顶。在悲痛不已的同时,我也想起了我与何冠奇老师的不解之缘。

我是一个最普通的、生活在最基层的京剧爱好者,何冠奇老师是国家一级导演,著名京剧编导、演员,原烟台京剧院业务院长,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我们相差如此悬殊,但我对何老师非常熟悉,甚至我们还有过近距离接触。

我第一次“认识”何冠奇老师,是在二十多年前的烟台电视台上,他在烟台大学的课堂上给学生演讲京剧知识。他那特殊的有些沙哑的声音、特有煽动力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在电视台上就经常看到他了,因此对何老师也就有了一些了解。何老师生于1939年,北京人,10岁时以少先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北京的开国大典,中国戏曲学院第一届本科毕业生,集编、导、演于一身,写出过以焦裕禄事迹为题材的著名京剧剧本《风雪探亲人》,编导了著名新编历史京剧《甲午恨》。1970年调入烟台京剧团并定居烟台,退休后与夫人宋艳玲(也是著名京剧演员)双双被聘到上海戏剧学院教学,以后正式退休又住回烟台。正式退休后,仍不遗余力地进行京剧的演出、教育、普及等工作。可以说,何老师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京剧事业。

作为一名京剧爱好者,我非常崇拜何老师,总想有机会见他一面。虽然我们同属烟台地区(当然何老师身居烟台市区,我居住在偏僻的农村),相距也只有一二百公里,但由于自己不善交际,再感觉我们之间的身份差距太大,所以一直没有主动去见何老师。

机会终于到来了。2011年5月29日,我听说,何老师将率领团队于这天下午到离我们村十几里地的东山村进行演出。我毫不犹豫地骑车提前来到演出场地。我问工作人员:我可以见一见何老师吗?工作人员回答:完全可以!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容易!我在村委办公室里见到了何老师,我激动地心

将要跳出来。我眼前的何老师,同在电视里见到的完全一样!我很高兴我带来了笔和本子,带来了能照相能录像的手机。我请何老师签名留念,我本以为能签个名字我就很满意了,没有想到,何老师拿着笔认真思考了几分钟,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赵明通先生:有您这样的热心而忠诚的戏曲爱好者,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让我们共同努力吧!深表感谢。何冠奇2011年5月29日于海阳东山。”我又提出同何老师合影留念,何老师也痛快地答应了。在一位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的心愿实现了。我把我与何老师的合影和他给我的题词存在了电脑里,这是何老师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这次演出,是应东山慈善会、烟台程氏宗亲联谊会之邀,由何老师带队来到海阳市行村镇东山村进行戏剧下乡演出的。其中烟台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刘东利和李殿清夫妇、王晓艳、郭岩等老师,演唱了《钓金龟》《梨花颂》《红灯记》等京剧名段,烟台吕剧院演出了著名大型剧目《姊妹易嫁》。何老师主持了这场名为“情系乡亲——京剧吕剧名家演唱会”。他在开场白中说:“我借用一位老乡的话说,过去你们只是在电视里看到何冠奇,这次看到活的了!”他幽默风趣的语言,把全场上千名观众逗得哈哈大笑。我还把何老师主持的开场白和演唱会中的著名唱段录了像,我将永远收藏这珍贵的资料。我非常庆幸,我得到了我与何老师的合影、何老师给我的题词、何老师的主持演讲录像以及这次演唱会的精彩唱段。

我本来还想,等有机会一定再去登门拜访何老师,但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这也是我非常遗憾的事。

对我们京剧爱好者来说,76岁的年龄还是太短暂,因为我们还没有喜欢够何老师,何老师还有许多没有做完的事。但是,当我看到,从城市到农村,还有许许多多京剧痴迷者;我还看到,许许多多几岁十几岁的孩子,唱念做打有模有样,我想对何老师说:何老师安息吧!您未竟的京剧事业香火有继,您一生钟爱的京剧艺术后继有人!

家乡吃水的回望



翟在科

据报道,南水北调目前客水已惠及莱州、招远、龙口、蓬莱。莱州涌来了“救急水”,这使我想起了家乡吃水的变迁。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村吃水全靠那为数不多的几眼水井。家家都备有水缸、水桶(村里叫水筒)、担杠、井绳。井绳是到井上提水的用具,俗语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井绳盘曲在井沿上,真和长蛇相似。井绳(当地叫攢绳)有苞米秸粗,有的用蒲草拧编而成,一丈多长,下头拴着铁钩(有的是木构)。铁钩有些奇巧,钩的上端要打造一根筷子粗、指头长、有弹性的铁舌头,铁舌头要与铁钩的末端靠近,以便打水时阻止水桶滑落水井。

到井上打水是大人的事。小孩子到井边,弯腰面对黑洞洞的水井,风险极大,可是我十岁出头,便开始“上前线”了。起初,用一只大水桶和一只小水桶。我站在离水井稍远的地方,井绳摩擦着井沿,用小木桶把水拖上来,灌进大水桶,然后前小后大很不对称地把水挑回家。年岁稍长,我就独当一面。两腿骑跨在井旁,水桶送下去,摇摆着井绳,水桶在井底左右晃动,等水桶底朝上时,井绳往下一送,砰的一声,水桶便钻进水里。然后一把一把将水桶拔上来,有了些楞劲,带上了大人的气势。

1954年,我求学告别家乡。后来听说有人跳井,我挑水的那眼水井报废,不再给村人无私地贡献清凉甘甜的水了,村里人吃水只好挤到远处的水井。文革后我回家,发现每家每户都在院子里安装了手动压水机。我见到的压水机,半米来高,上端类似水壶,“水壶”上固定着半米来长的押杆,押杆连着活塞,“水壶”里舀上点水,起着密封活塞的作用。

一弯腰一弯腰地就能把水抽上来,水流进桶里,再倒进缸里。村南有个泉眼,常年流水。当时“村委”(叫大队)发动村民在泉眼处挖掘水塘。水塘成功了,但村里的水位却逐年下降。可能地下水脉相通,修了水塘,截断了水源。

到了改革开放的年月,家家户户的压水井也都废弃了,村里人吃水被逼涌上了水塘。每家都必备个铁制小推车,小车上卧着个方形或者圆形水箱。方形水箱有学生单人课桌那么大,圆形水箱比太阳能水箱略粗稍短。各种水箱的顶端都焊接着碗口大的进水口,口上有盖;水箱的后下方,焊有出水开关,水推回家,打开水龙头,灌进水桶。那阵子,村里有专人用水泵抽水,供应村民,三天一次,定在下午三点钟。

每到供水时间,村民都忙碌起来,各家各户都推着小水车,浩浩荡荡来到水库边,杂乱地拥挤在那里。水泵一响,粗急的水流便从水龙头里喷涌出来,有人操控着水龙头往各户的水箱里灌水。由于水流冲击力大,水龙头也不太听话。人们的脸上常常喷上水珠,衣服也被溅湿。地上一会儿便泥泞不堪,鞋在泥水里践踏,后来都穿上水鞋去推水。由于大伙都有争先恐后的心理,所以打水的人也常常为争个有利的位置,闹得脸红脖子粗,场面和气氛时时充满火药味。

后来,村里建筑起一座水塔,水塔供水,水流驯服得多,不再见慌乱的场面。再后来,由于灌溉和吃水时时冲突,而且,经有关部门检测,水塘的水质也不达标,村里便筹措资金打了几眼深水井。接着统一规划,纵横交错地在村里埋上了管道,管道把深井水输送到各家各户的院子里,老百姓从此也吃上了“自来水”。

没有手机的年月

王新奉

四十多年前,咱们烟台还没人有手机。就连座机电话,也只是单位和领导及个别人的家中才有,一般平民家中还难以企及。生活中自然就有诸多不便,其间有两件小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1970年夏天,我有了第一个孩子,岳母从青岛老家来帮我们看小孩。秋天,在银川支边多年的大舅哥要回山东探亲,决定先到烟台来看老娘及他的小外甥。要坐两天两夜火车在北京换车,该是第四天早上到烟台。可是,早晨我骑脚踏车去接站时,没接着,工作人员说是晚点了。那个年代火车晚点并不是稀罕事。所以,问他们到底几点能到,他们也不说。

那时我在小黄山脚下的警备医院工作,因上午还要值门诊班,只好回医院上班。回来后一边看病号,一边心里惦记着:“大舅哥到站后咋办?大老远的,又带着不少行李。”可那时既没有出租车,也没有手机联系,军内电话与地方电话也很难接通,所以询问车站也不方便。

一上午,我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到中午我正准备下班时,只见一个战士把大舅哥带到了我面前。原来他九点多钟下火车后,见没人接他,就自己背着两大包行李,一路打听着找到警备区。人家告诉他穿过毓璜顶公园,越过毓西路,西面山上就是。

因为当时的医院门诊部,临时安在上山的小路北侧的一个庙店里,而

病房则设在路南一个闲置车库中,既没门头也无牌子。所以他竟越过了医院,背着两个沉甸甸的大包袱,一直爬坡往山里走去。直到到了山中另一部队门前,见有战士站岗,以为是到了医院。可一打听,人家告诉他已经走走了。幸亏其中有人认识我,派了个战士把他送了过来。

第二件事是1974年,大舅哥已调回青岛沧口工作。因老家有孩子结婚,需要几条新鲜鱼做席用。当时,青岛比咱烟台买鱼还难,于是又来信让我帮忙买,并说明只要有鳞不是和尚鱼(当地对光鱼的别称)就行。可是咱烟台当时鱼也不太好买,尤其是做席用的有鳞鱼(如黄花鱼、白鲢鱼之类),市面上也很少见到,我只好托司务长到当时的红利市场军供部看看。还不错,他给我买了几斤巴掌大的小镜鱼。可是,怎么捎回去又成了难题。

幸好当年铁路上有军代表,他们都和我同住警备区家属大院。有人告诉我,先把鱼收拾好,用盐卤一卤,晾个半干。然后他帮我找随车军代表,捎到沧口站停车时,让我大舅哥上车去取就行。并要事先通知他到第几车厢找军代表室。还让他胸前戴个白色大兜子,手里拿张《青岛日报》做标记。真是和当年地下工作者接头对暗号差不多。但你可别说,事情却真的完成得挺顺利。

现在,每当我忆及以上事件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唉,那时若能有个手机该有多好!